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九二八期 ——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401d)

【回首文革】	参加中央工作组追查“梁效”文章	战毅军
【史海钩沉】	再说“红八月”里的西纠	杜钧福
【文革一页】	江青怎样把手伸向体育界	钱 江
【文革访谈】	林彪专机服务队长访谈	陈 雷 • 黄建河
【当事者言】	红卫兵大串联北京接待记	陈徒手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回首文革】

参加中央工作组追查“梁效”文章

• 战毅军 •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当月7日上午，我先后接到二机部秘书长张兴和政治部副主任赵振清的通知，他们悄悄告诉我：午后在刘伟副部长办公室开会，将被派往驻光明日报社的工作组。在下午的专题会议上，刘伟副部长传达了紧急任务：中央将派出多个工作组进驻新闻单位开展工作。并得知：毛主席逝世后不久，10月4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署名“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为“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大造舆论。10月6日，党中央果断采取措施，抓捕“四人帮”。为迅速接管被“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工具，中央决定立即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光明日报社等新闻单位派驻工作组。暂时由中宣部负责人耿飚协调与指导，中宣部作为办事机构，设在钓鱼台8号楼办公。以二机部刘西尧部长为组长的工作组，将尽快进驻光明日报社。工作组由二机部副部长、党组成员王介福，政治部副主任赵振清、组织部负责人茅万斌、组织部干事孟连祺、保密委办公室主任张维鹏和我，以及来自中组部及其他部委的孙中范、王维澄等人组成。

次日，工作组成员在光明日报社集结。进驻光明日报社之后，工作组立即召集报社党组成

员和编委会成员开会，传达了中央派遣工作组进驻光明日报社的主要任务，并宣布对报社党组成员、总编莫艾，党组成员、副总编孙关龙采取暂时隔离审查的措施。由报社党组成员、副总编张常海主持工作。第三天，刘西尧部长从外地赶回北京，听取了工作组两天来的情况汇报，传达了纪登奎副总理的指示：光明日报社工作组的主要任务是：一、控制舆论导向，把好关，力争不出问题；二、围绕《光明日报》刊发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文，开展专案审查工作，查清文章出台的来龙去脉以及相关的人和事。目前，工作组着手进行两方面的工作：一，由孙中范、王介福等带领总编人员，进行报纸版面的审改大样工作。此时，中央尚未公布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四人帮”仍旧控制着舆论阵地，报纸上大篇幅刊登“按既定方针办”和批判邓小平的文章。根据刘西尧部长的提议，在没有公开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之前，多编辑一些科学技术方面的文章，维持报纸各版面。二，由赵振清、张维鹏和我等多人组成专案小组，开展对《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文相关人和事的审查工作。会议结束之后，专案小组立即将莫艾、孙关龙两人分别实行监控，并查抄了两人的办公室和宿舍。将两人的有关资料和工作笔记，以及与《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文相关的档案资料，分类封存。同时，派专人做好莫艾和孙关龙的监控工作。

10月14日，党中央对外宣布已经粉碎“四人帮”。举国同庆。工作组的工作全面铺开。专案组先后多次分别对莫艾和孙关龙进行了审问。孙关龙交代：10月3日中午，由迟群、谢静宜来报社将稿件交到他手上，要求次日务必见报。迟群走后，他当即转给总编莫艾，莫艾阅后安排他去总编室发稿。他们两人承认对签发《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负有政治责任，已铸成严重错误，追悔莫及。但一再申明没有参与过这篇文章的研究和起草，也没有推敲和修改。涉案人员只有他们俩，稿件在报社停留15个半小时，夜班编辑仅仅做了校对，一字未改，并由孙关龙在编辑室盯到开印为止。我们也向当班的几个夜班编辑了解了情况，他们反映：那天晚上，孙关龙值夜班，全程负责，亲自校阅签字，开印后才离开。他们几个人只参加过一校、二校。

尽管对稿件在报社停留15个半小时的过程，及有关经手人的情况有所了解，但大家分析，一是对孙关龙与迟群、谢静宜的关系尚需进一步查清；二是由迟群、谢静宜转来的稿件，究竟出自何处，包括上线的活动，缺少线索，这是弄清问题的关键。要抓紧对孙关龙和莫艾再做些工作，消除顾虑，进一步揭发上线，了解文章产生的背景；同时，双管齐下，由张维鹏和我去秦城监狱提审迟群和谢静宜。

迟群和谢静宜由卫戍区收审，关押在秦城监狱。“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多囚禁于此，“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大部分成员，也收审在那里。一审迟群，我们向他说明了需要回答的问题，并重申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面对迟群的歇斯底里，我晓以利害：必须认清大局，识时务，不要聪明反被聪明误，必须回答三个问题：一是，《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这篇文章的用意何在？二是，由谁决定发表？三是，为什么选择在《光明日报》发表？我特别指出：必须丢掉幻想，彻底交代这三个问题，珍惜这个立功赎罪的机会。

接着，我们提审了在押的谢静宜。她的表现不同于迟群，她曾经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过，被江青器重，受影响颇深。虽然被囚禁，但每天都能听广播、看报纸，粉碎“四人帮”对她震动很大，深感负罪。她回答：《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稿子经过了“文革首长”研究，曾作为“行动纲领”由姚文元组织“清华200号”拟稿。与迟群有联系，当时的召集人是李加宽，我也参加了，参与了传递修改稿和联络工作。她说，《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稿子，经过姚文元最后修改，让迟群和我送去的，指定要次日见报，当时姚文元还询问我们时间怎样？迟群说不会有问题。当问及“文革首长”指的是谁？她回答：一般都称江青、张春桥为首长。

二审迟群，他依然态度刁滑，不肯说出参与《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文见报的具

体情况。我们以谢静宜坦白赎罪交代问题的态度告诫他，他才吞吞吐吐地说：只负责联络，没有参加过研究，曾听姚文元说过，中央文革领导在讨论这篇文章时，明确其核心问题在“夺权”，张春桥称其为“行动纲领”，说“按既定方针办”的命题，是画龙点睛，抓住了要领，有动员作用。他一再声明这都是张春桥的话。他说：稿子是姚文元修改后交给他和小谢送到光明日报社的。在回答为何交给孙关龙时，他说：正是午休时间，孙关龙接的电话，知道他是报社副总编，造反派头头，过去为发表“梁效”的文章有过联系，便让他亲自来传达室，将材料交给了他，告诉他这是一篇重要文章，文革首长已过目，一定要安排在次日见报。当我们再次追问：光明日报社是否有人参加这篇文章的研究与起草？迟群立即说：报社没人参加研究和起草。过去在《光明日报》发表过几篇“梁效”的文章，与孙关龙见过几次面，比较熟悉。

三审迟群，当迟群确认已经把江青也给抓起来了，才陆续交代这篇文章的来龙去脉：最初由姚文元根据中央文革领导研究的意图，组织“清华200号”起草了《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并亲自做了几次修改。张春桥也参加过审核修改，详细情况可以问“清华200号”的李加宽。至于文章发表的时机问题，迟群说自己不清楚，只负责传送。

“清华200号”是“四人帮”一个御用写作班子的所在地，李加宽是北大历史系的副教授，造反派头头，“清华200号”主要负责人。这个写作班子的大部分人是从北大、清华的文、史、哲等学科选调过来的教师，有专家教授，也有学生，约近百人，常以“梁效”（清华、北大“两校”的谐音）署名在“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多数是中央文革派任务，也有他们自己选题，经中央文革同意组织撰写。多由姚文元审定发表，也有李加宽审定后发表的。我们在二龙路看守所提审了李加宽。他承认组织写过《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文章，姚文元曾同他们研究过内容，阐述了江青、张春桥的指导思想及重要性。但是，李加宽不肯提供具体活动的材料。经过我们的劝导，再次重申政策，并用谢静宜、迟群的坦白态度启发他，他才说了具体情况。在唐山大地震后期（约8月初）受命组织动笔，一个多月，三易其稿，送姚文元修改过两次。重点在于如何控制领导权。第二稿才逐步明确“按既定方针办”是毛主席的临终嘱咐，要求参照9月16日“两报一刊”社论强调其重要性，形成了社评的中心内容。9月19日由姚文元主持修改座谈会，他也参加了。《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这个命题，是张春桥提出来的，认为中心突出，醒目易记，用语既隐晦了“夺权”字眼，又使人觉得像“行动纲领”。在这次会议上姚文元还提出这篇稿子不是一般的政治论文，是传达重要行动的信号，见报前必须严格保密。何时发表，由文革首长决定。李加宽证实：迟群和谢静宜为这篇文章来过“清华200号”三次，主要是传递修改稿，过问工作进度。

在多次审问及核实的同时，内查外调紧锣密鼓。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工作，专案组认真分析了提审迟群、谢静宜、李加宽的情况，莫艾、孙关龙交代的情况，以及当日值班编辑及有关人员反映的材料。大家认为：初步查清了《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这篇文章出台前后的情况和有关责任人，但还没有能够提供更多的上线活动材料。11月18日，刘西尧部长召开工作组专题会议，分析研究了专案小组对《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文有关情况，认为这篇文章的来龙去脉已初步查清，它配合“四人帮”的“夺权”活动，以所谓传递“启动”信号，动员实施“夺权”行动为任务，故而张春桥称其为“行动纲领”，可见其重要性。按照姚文元的说法：不是一般的政治论文。但这些都是根据口供的分析和推论，还应进一步查证。涉及审问“四人帮”核心人物，有待中央决定。会议建议利用钓鱼台碰头会的机会，进一步沟通，为下一步工作做好准备。

设在钓鱼台的中央宣传组，每周二召开派驻各媒体工作组碰头会。我和茅万斌随同刘西尧部长参加了碰头会。会议由耿飚主持，大家交流了各组的工作进度和需要研究的问题。光明日报社工作组重点谈了《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文的审查情况。会议认为，经过对迟

群、谢静宜和李加宽的提审，以及对报社内部的查证情况，《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文的来龙去脉和有关负责人已基本查清，与中央领导的判断大体一致，可以将调查材料转给中央设置的“四人帮”专案组并案处理。至于取证问题，也由他们酌情办理。报社内部涉案人员的调查处理，应将清查情况综合分析提出处理意见，与中直机关党委协商解决。耿飚表示，各大媒体凡有列入中央专案的问题均应仿照光明日报社的办法，查清后移交给中央专案组并案处理。他强调：当前各工作组的任务，仍应以控制舆论导向为主，在宣传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团结在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加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同时，继续推动深入揭批“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罪行，从思想上肃清影响，清查有关的人和事，搞好新闻队伍的思想政治建设，抓紧把领导班子搭配好。

在这次碰头会上，派驻新华社工作组的负责人建议，如能将光明日报社专案调查的情况加以整理写篇评论，将对深入批判“按既定方针办”的政治阴谋，进一步剖析“四人帮”篡党夺权野心，瓦解帮派组织，肃清其流毒影响，掀起大批判新高潮很有意义，并提议将文章题目定为《灭亡前的挣扎》。耿飚略加思索，表示赞同，并建议把题目改为《灭亡前的猖狂一跳》。会议决定，由光明日报社专案组尽快向新华社提供调查材料，并由新华社会同人民日报社组成写作班子，争取在11月底拿出初稿，经中央审定后，以评论员文章同时刊登在“两报一刊”上。人民日报工作组组长迟浩田认为这样很好，并可视大批判发展情况，加写“编者按”。当晚，我们专案组复查了内查外调的情况，并逐条核对了提审口供和访谈查证的材料。11月20日，由我整理成“备忘录”，向新华社有关撰稿小组做了口头汇报，并递交了“备忘录”。三天后，专案情况汇编提交工作组审议之后，正式移交给中央设置的“四人帮”专案组。

12月上旬，随着中央“两报一刊”发表新华社评论员文章《灭亡前的猖狂一跳》，进一步推动了光明日报社的“揭批查”工作。紧张的专案工作也在大批判的逐步深入之中告一段落。2月8日，刘西尧部长召开工作组例会。有关刊发《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来龙去脉、相关的人和事，已完成调查，报送中央“四人帮”专案组，初审认可，并案处理。近来也没有再发现新的问题，完成了专案工作的主要任务。此外，深入“揭批查”的运动顺利展开，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为整顿新闻队伍提供了参考。同时，工作组还酝酿产生了报社新领导班子的人选，并报送中央获得批复。

1977年1月，光明日报社的“揭批查”运动和业务工作进入正常工作状态，中央同意派驻光明日报社的工作可以结束，并任命了报社新领导班子。不久，报社召开欢送会，工作组成员陆续撤回原单位。

（作者为原二机部政治部办公室主任）

□ 《炎黄春秋》2013年第12期

~~~~~  
【史海钩沉】

再说“红八月”里的西纠

• 杜钧福 •

我在博客上发表了一篇关于陈小鲁道歉和西纠罪行的文章，就我所知的材料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些分析。有一位朋友没有具体驳斥我的文章，只是泛泛地说，西纠是周恩来组织的纠察队，用来制止武斗，罪在毛泽东。

这种说法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无法回答下列问题：

公元1966年“红八月”里，北京市城区和近郊区有1772人罹难，究竟是谁打死的？

另一要害问题是：为什么在西纠成立的第二天，被打死的人不但不降反从两位数升至三位数呢？

对于第一个问题，现在的典型回答是：红卫兵，抽象的红卫兵。

做出这种回答的朋友为什么不再追问一下：究竟是哪些红卫兵打死了这些人呢？

社会上死了一个人，警察要去鉴定一下：是正常死亡还是自杀他杀？如果是他杀，警局有“命案必破”的要求，那么，在首都北京，光天化日之下，有1772人被折磨惨死，为什么没有人追究呢？

蒯大富是红卫兵。他在1968年的清华七二八事件中，指使他的部下开枪抵抗进驻的工宣队，打死了几个工人。他的部下在清华两派的武斗中也打死过几个学生。文革后，他被判处了十几年徒刑。再说北航的红卫兵韩爱晶，在批斗彭德怀的斗争会上殴打了彭，也在文革后被判处了十几年徒刑。

那么，打死几千无辜普通北京市民的事件反而没人追究，只是泛泛说是“红卫兵”，是哪些红卫兵呢？

更有甚者。有一位尹敏志，在《爱思想》上撰文《红卫兵运动的起源》，居然说：“总体来说，在所有的红卫兵派别中，‘老兵派’是相对来说是最‘理智’，破坏性也是最小的。暴力毕竟只是他们用来显示自己‘革命性’的手段而已，对于这个迟早会从父辈那里继承过来的江山，何必要将其打得千疮百孔呢？‘老兵派’希望的是文革不要持续太久，达到目的即可，见好就收。但‘四三派’‘四四派’中的很多人则纯粹是为了发泄对社会的不满而投身文革，是为暴力而暴力。在著名‘红八月’里，他们走上街头集体狂欢，一时血雨腥风。”

这位尹敏志，连文革史的A B C都没闹清楚，就大言不惭，敢写这种文章。北京市中学里的“四三”、“四四”派是1967年以后才兴起的派别，在1966年的“红八月”里还没有影儿呢！

“四三”、“四四”派是平民红卫兵或一般家庭出身的红卫兵。他们能在“红八月”里“走上街头集体狂欢”吗？

北京六中有一位出身非“红五类”的学生王光华，在1966年8月7日，不顾学校红卫兵不许非红五类学生外出串连的禁令，到外地串联。学校的红卫兵领导马上布置西纠人员到车站拦截，又派人跟踪。和王光华一起外出串连的三名学生回来后，学校西纠头目派人将他们抓到学校，毒打一顿，押往劳改所写检讨，同时派人到重庆追捕王光华。9月27日王光华回到北京，他先到校长家销假。西纠侦得这个消息，派人在校长门口等他一出门即予抓捕，押到学校劳改所拘禁。

“当晚九点多钟，全校戒严。王光华被押到‘劳改所’，刚一进门姜晋南（西纠头目）劈手给了他一个耳光，随后剥去他的上衣。然后，十来个暴徒解下皮带，兽性大发，手持各种凶器（木枪、木棒、皮带、钢丝鞭、电线鞭等）蜂拥而上。四五个人一组，把王光华围在中间，用

木枪向他身上猛刺，乱扎，木棒向他背后猛击，肋骨顿时被打断数根。他翻倒在地，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但随之而来的是更凶恶的毒打，和狂妄的怪叫：‘要馒头，不要窝头！’他昏了过去。这时一个西纠队员猛踢他的头颈，狠狠地吼道：‘触及触及你的灵魂！’”（六中北京公社的揭发材料）次日又对他数次毒打，直至打死。死后很久后，他们才去通知家长，说王光华是反革命，被打死了，还跟家长要了28元火葬费，并骗走了他的自行车。

据该校外出串连的学生说，火车上有北京红卫兵组织的临时纠察队，逐车厢检查串联的学生是否“红五类”，凡不是“红五类”的，通通赶下车。他们知道北京车站被西纠把持，害怕被打，只敢在丰台下车。

还有一位曾国藩的后人、“名媛”聂光锡，就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在火车上被北京红卫兵活活打死。

所以，在“红八月”里，北京城是西纠为代表的老红卫兵的一统天下。他们布置了天罗地网，甚至向全国派员追逃。只有他们是克格勃，是冲锋队，是太上皇，是阎王爷。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存在另外系统的红卫兵走上街头、集体狂欢，弄出血雨腥风。

当然话不可说绝。《记忆》曾登载范世涛文章，说在“红八月”里崇文区的一桩命案不是红卫兵所为，是一支工人“赤卫队”干的。这当然是可能的。另外，在高干子女的西纠系统之外，是否还有个别工农子弟组成的红卫兵参与，也是值得研究的课题。但现在看来，即使有，也不可能是主要的。

但是尹敏生所说的后来的“四三”、“四四”派组成人员，在“红八月”里是绝对不敢乱说乱动的。再说，在“红八月”里被冲击的被抄家的，绝大多数家庭都属于中产。许多“四三”、“四四”派就来自这样的家庭，即使他们去抄家，他们能下得了毒手吗？

每一个知道或研究“红八月”历史的人都会发出疑问：这些十几岁的红卫兵为什么能那么残酷呢？是什么样的情况才能造成大规模的死亡事件呢？

这是文革前十几年学校教育和社会熏陶的结果。雷锋叔叔不是也说，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吗？“红八月”的红卫兵就是在演绎这个冷酷无情。

但是即使如此，这种冷酷无情，这种非人性，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才能发泄出来，绝对不可能是红卫兵自发产生的。

这就是当今西纠诸君的愤懑所在。

大规模死亡事件的直接导因是抄家。抄哪些家呢？名单是派出所给的。

为什么抄家导致死亡呢？因为抄家导致刑讯，刑讯导致死亡。

为什么要对被抄户刑讯呢？因为要他们交出枪支。

西纠红卫兵就是奔着这个去的。他们被告知，隐藏在中南海附近的阶级敌人藏有枪支弹药，一旦造反，被害的就是我们的父兄。这如何不能激起红卫兵们的愤怒呢？

阶级敌人藏有枪支弹药，能痛痛快快交出吗？不给他们点厉害尝尝，不往死里打，他们能

老实交待吗？因之，刑讯是必然的，大规模死亡也是必然的。

实际上这是政府行为。政府行为是通过派出所和红卫兵实施的。这红卫兵必须是靠得住的、放得出去收得回来的。只有高级干部自家子弟才符合这个要求。我们看看，在9月初，该抄家的“黑户”已抄的差不多了，该驱逐出北京的也已经赶走了，于是北京市打死人的数目嘎然而止。

为什么不能把这个任务交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呢？因为他们有一些独立思考能力，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

当然，对大多数抄家行动，所用的借口不是搜查枪支而是针对西纠发明的“黑六类”。“黑六类”包括资本家，而他们把资本家扩展到房产主、小业主，这就囊括了几乎所有中产阶级。只有撒这样的大网，普遍追查“变天账”和金银财宝，才能使隐藏的阶级敌人和他们的枪支不致漏网。

所以，北京“红八月”的大规模死亡事件是由一系列环节组成的。现在说西纠是反对武斗的，你说的是哪一个环节的“武斗”呢？这里根本没有什么“武斗”，只有虐杀。

对中产阶级这一驱逐和杀戮事件是官方蓄意组织的。这在许多高级干部事后的讲话里并不像现在的西纠诸君那样隐晦。在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谭震林等人的讲话里都对红卫兵的这一成果表示满意，周恩来和叶剑英的讲话还透露了“黑户”这一名词，指的就是被抄家的“独门独户”。从他们的讲话也可感知，虽然他们交待给红卫兵的抄家目的是搜查枪支弹药，但根本目的是给予这些中产阶级以一次打击，使他们身败名裂，被逐出北京。

我说过，在特定意义上，红卫兵也是受蒙蔽的，就是指的这个意思。有一位先生在网上骂我替红卫兵说话，就是替纳粹说话。他根本没听懂我的意思。

1966年的“红八月”中的大规模屠杀事件是由一连串环节构成的。这一事件又是更大时间尺度的一连串事件中的一件。

这一连串事件也许是从彭真要把北京办成“水晶石”开始的，但文革开始后主要是由新成立的“首都工作组”实施的。

第一件事是将犯错误的高级干部逐出北京，包括彭德怀、黄克诚、谭政等。

第二件事是将社会上一些“敌我矛盾”分子收捕逐出。例如胡风已被释放，又重新收监并放逐到成都。已定为人民内部矛盾的美学家吕荧则被关押到茶淀劳改农场，在那儿悲惨地死去。

第三件事是将在押犯人包括劳改人员向内地转移，例如将葛佩琦等人从北京监狱押往山西大青山煤矿劳动。

第四件事是以支边为名将北京市的社会青年或有小过失的青年骗往新疆。剩下的社会青年在“红八月”里被当作“小流氓”打死不少。

第五件事称为“西公”专案，是清理一些单位内部，将政治上不可靠人员予以处理，其中一些人押送山西五台和江西上饶两个集中营。此事因文革爆发未能完全施行。

剩下的不安全因素就是那些不好监视的深宅大院里不是地富反坏右也没任何前科的居民了，就是叶剑英所说的一万多“黑户”。如何清理他们是个难题。恰好这时红卫兵诞生，于是借助于红卫兵暴力做这件明知违法的事。一万多户，近十万居民，将他们驱逐出祖祖辈辈居住多年的家园，没有极端残忍的私刑和死亡的威胁不可能做得那么干净利落。于是大规模屠杀就成为必然的了。

这就是血淋淋的“红八月”的由来。

现在把“红八月”的罪责推给抽象的“红卫兵”，意思是辨不清来源的红卫兵在混乱中干的。其实，局面完全在掌控之中，一切都是按计划进行的，没有漏网之鱼。

9月16日，异于老红卫兵的中学生造反派《首都兵团》成立。9月下旬，抄家风已过，当地派出所找到他们的东城分部，以为他们是原来的“东纠”，说有一家居民有特务嫌疑，叫他们去抄家（胡庄子：《首都兵团——中学红代会——四三/四四派》，《记忆》100期，也见胡庄子博客）。这家“特嫌”就是一万多“黑户”的漏网之鱼，终未能逃脱被抄。

这个例子说明，派出所的任务，即使是造反派红卫兵也是心甘情愿去做的。也正是这个原因，西纠诸君不肯将此事算在自己的帐上。但是，派出所在交待任务的时候，一般不会明确叫他们把人打死。国务院领导在交待任务，叫他们到派出所领取名单时，也不会明确叫他们打死人，至多有个暗示。这个细节我们不知道，但是大兴县的集体屠杀事件可以作为参考。

1966年8月26日，大兴县公安局治安科张副科长召集会议布置抄家事。有红卫兵问，打他行不行？张说：“在气愤之下，打两下也没什么。”又问：“打死怎么办？”张答：“打死就打死吧！”（孙言诚：《血统论和大兴“八三一”事件》，《炎黄春秋》2012年2期）

所以，如何执行，是有个自己选择的空间的。正如苏东剧变后，审判对逃往西柏林的居民开枪的东德警察时，指责他们，尽管是不可抗拒的命令，你完全可以把枪口调高两厘米。所以刑讯致死如此多的普通居民是不可饶恕的反人类罪行。陈小鲁作为西纠领导应对此负责任。你说，西纠是反对武斗的。8月19日中山公园的批斗会上，几位北京市教育界领导干部在你面前被皮鞭抽得头破血流。你坐在主席台上去阻止了吗？

但是，死人的事，中央领导是预见到的，他们有农民运动和土地改革的经验。在听取吴德汇报时，林彪说，不要打死人，就是他预料会打死人。

所以提起此事时，西纠诸君都把矛头指向毛泽东。这种心情我很理解。但我刚批判过的李慎明文章中的一句话我很赞成：“但失误和错误也不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澄清对毛泽东的几个误解》）在“红八月”和西纠问题上，周恩来也要承担相当的责任。

1966年“红八月”里，北京城区和近郊区1772人惨死的悲剧至今真相不明，死者的灵魂得不到安息。我根据已知的零星有关文献，力图拼凑出事件的完整轮廓。其中一些是我推测的，原因是缺乏当事人的第一手材料。对此文和我的有关几篇文章，我希望得到文革史学界的指导，也希望作为当事人的西纠诸君和其他有关人员指正。

□ 选自《杜钧福博客》

~~~~~

【文革一页】

江青怎样把手伸向体育界

· 钱 江 ·

◇ 从文艺发家，向体育伸手

江青是“文革”的旗手，最初是从文艺革命发家的。1966年“文革”爆发之后，她于当年夏天出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实际上完全不把组长陈伯达放在眼里，完全控制了取代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枢密机构。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江青进入中央政治局，取得了政治上的稳固地位。

随着一大批革命元老被打倒、“靠边站”，江青取得了极大的权力，并且逐渐熟悉了对手中权力和本人身份影响的运用。九大以后，扩大政治权力范围成为江青的主要活动，她采取许多步骤侵削主要政敌林彪的势力，还将自己的政治势力打入体育界。这中间有两个不容忽视的原因。

其一，在于体育与文艺具有天然联系。如人们常说的那样，文体不分家，二者民众基础广泛，社会影响大。江青利用自己的“文化革命旗手”地位，已将文艺牢牢掌控，此时得陇望蜀。

其二，江青本人很爱好体育。她在青年时代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体育爱好者。江青长于文艺演出，有很好的舞蹈基础；她熟悉京剧，也具备京剧演员所必需的武术基本功。对现代体育运动，江青亦多有练习。她在学生时代有过跨栏跑经历，打过网球，这在当时的中国女性中属凤毛麟角。

1937年到延安以后，特别是1938年夏和毛泽东生活在一起后，江青爱上了骑马。她的马上骑乘功夫相当扎实，座下奔马跑得再快也很难把江青摔下来。

就在爱上骑马的同时，乒乓球成了江青和毛泽东共同的体育爱好。原来，1937年底，美国医生马海德到延安担任中央军委卫生部顾问，把传入中国不久的乒乓球引入了陕北高原。根据马海德绘制的乒乓球台尺寸，延安木匠制作了两张类似八仙桌的球台，拼接在一起就是乒乓球台了。毛泽东在延安学会了打乒乓球，江青就是他的主要陪练者，而且在球技上超过了他。

但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10多年间，江青时常被小病困扰，为治疗花去了不少时间。到20世纪60年代初，江青的身体痊愈，有更多精力投身于政治活动了。

“文革”之初，江青全身心投入。据1967年至1968年担任江青秘书的阎长贵回忆说，这段时期江青的身体相当好，完全投身于“文革”，几乎没有体育活动，连扑克牌也不打。1967年夏天有一段时间，北京特别热，她的身体有些不适。毛泽东对她说，可以到外地去一段时间，但江青没有去。这年，江青几乎没有离开北京。

这种情况，到九大以后改变了。

◇ 频繁召见乒乓球选手

1969年春中共九大以后，“文革”造成的混乱局面大体趋向稳定，被全面军管的国家体育运动队逐渐恢复训练。这其中，乒乓球队恢复训练最早，而且得到周恩来的支持。1969年10月初，中国乒乓球队主力选手多次受到宴请，参加周恩来主持的国务宴会。周恩来在宴

会中和乒乓球选手庄则栋等有过短暂交谈，要求他们恢复训练，他本人要看体育表演。

果然，周恩来于1969年10月10日，在新落成的首都体育馆观看了运动员的表演。他首先观看了男子跳高选手倪志钦的表演。倪志钦跳过1.90米的高度时，周恩来站起来鼓掌，并且询问了女子跳高选手郑凤荣的情况。

周恩来观看了体操、女排、男篮和乒乓球选手的两个小时表演。随后，他会见了国家体委军管会主任曹诚、符志行等人，对体育工作作了长篇讲话。周恩来的讲话总的精神是，“运动员绝大多数是好的”，运动队要恢复训练，因为人们需要体育运动。

根据周恩来的讲话精神，从1969年10月起，原国家体委所属各体育集训队纷纷恢复训练。到1970年夏，这些运动队又具备了出国交流的条件。

这年6月，尼泊尔王子比兰德拉举行婚礼，中国政府派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作为特使前去祝贺，并派遣乒乓球选手庄则栋等随同前去，参加为祝贺婚礼而举行的乒乓球邀请赛。这是“文革”开始四年来中国乒乓球队第一次出国，预示着体育国际交流开始“解冻”。

为此，周恩来等于6月4日晚10时再次到首都体育馆观看体操、女篮、男排和乒乓球队表演，并在表演结束后单独会见了乒乓球选手。这一回，江青参加了。讲话记录稿上，江青的名字排在周恩来、董必武之后，排在李先念、纪登奎、李德生之前。

周恩来讲主要是表达对乒乓球选手的关心。江青没有讲话（至少到目前还没有发现关于她讲话的记录）。可能是因为她对体育界的情况还不熟悉，所以保持了沉默。

然而江青进入角色很快。1970年11月3日，江青在钓鱼台国宾馆召见庄则栋等乒乓球选手，和他们打球，而且讲了很多话。

江青看起来很热情，说：我原来准备到你们那里去，但是警卫员说怕我感冒，不让去，就改在这里见大家。这时江青宣布：“等一会儿我跟你们打一打球，每人打三分钟，不能多打。”

江青说到做到，果然身着运动服，拿起乒乓球拍，和到场选手分别打了一会儿。

打球间隙，江青向选手们介绍了自己打乒乓球的经历。她说：在延安的时候，我打了一个夏天，那时陪我打球的人水平很好，和容国团差不多。江青特意向大家说：我已经七年没有打乒乓球了。而现在，身体好了，又可以打乒乓球了。江青这个回忆，和她在“文革”中两位秘书阎长贵、杨银禄的回忆是一致的。

和到场乒乓球选手们打完球，江青向选手们每人送了一本有她签名的《毛泽东选集》袖珍本。

从这时起，江青的“乒乓球热”掀起来了。三天后的11月6日晚，江青观看了中国乒乓球队和来访的越南乒乓球队的友谊赛。

7日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即将到欧洲参赛的七名乒乓球选手庄则栋、徐寅生、李富荣、张燮林、林慧卿、李赫男、郑怀颖。他向选手们询问了此行比赛的情况，还讨论了发球的问题。正在这时，江青由李讷和毛远新陪同突然走进了会见大厅。跟在后边的还有北京市委书记吴德。

乒乓球选手拿出了两个球拍，一个送给江青，另一个请江青转送毛泽东。江青则将自己使用过的一个乒乓球拍送给了运动员。至于这个拍子最后会到谁的手里，江青就不管了。然而江青清清楚楚地对选手们说：我现在每天要打五分钟到一刻钟的乒乓球。

说罢，江青拿起了拍子说：“我要和总理打一打球。”

周恩来于是也拿起了球拍，和江青对打了几个回合。场间休息时，乒乓球选手表示希望见到毛主席。江青回答：“我可以替你们致意，但可能性不大。你们还是和总理说，总理的面子比我大。”

接下来，江青和选手们谈起了阅读中国四大古典名著的事。运动员告诉她，现在《红楼梦》已经被禁止阅读了。江青跳了起来，说：“岂有此理，《红楼梦》里还有二十几条人命呢。”但是，要不要禁止阅读呢？江青实际上没有说。她开始具体地“指导”女选手郑怀颖，要她“练反拍”。而郑怀颖本来擅长的是正手的侧身攻。

自江青进场以后，大厅里就全是她的声音，周恩来沉默了。

◇ 属意庄则栋

就在这次和乒乓球选手会面中，江青特别属意三次蝉联世界男单冠军的庄则栋。她主动问：“小庄，听说你爱人是弹钢琴的？”

庄则栋的妻子鲍蕙荞是知名的钢琴演奏家，对此庄则栋点头认可。

江青说：“现在就叫她来弹给我听听。”

庄则栋为难了：“她在干校里。”

江青反应很快，马上说：“正好，我要找一个女的弹样板戏，把她调来吧。”

江青的一句话就有可能将妻子从农村调回北京，继续弹她心爱的钢琴，庄则栋对此自然心生感激。

江青立即拍板，要人即刻打电话找中央乐团负责人。但时间已经很晚，当时没有找到人。

江青扭头对吴德说：“你把这件事情办了吧。”

这在主事者来说不是难事。过了不久，鲍蕙荞回到北京，和庄则栋团聚了。在这件事上，当时庄则栋和鲍蕙荞都感激江青。

但是，也从这件事开始，江青和庄则栋的直接联系密切了起来，为庄则栋此后的政治悲剧悄悄拉开了序幕。

几个月后，江青又召来乒乓球选手，心血来潮地为他们拍摄人像照片，随后放大成12英寸

寸的照片，每人一张。但是，她给庄则栋送了两张，使这位乒乓球冠军受宠若惊。

江青和乒乓球选手们的密切交往从此开始了。她不时指定国手前去自己的住所进行体育表演，庄则栋几乎每次都去，都要上场打球。

不过，客观地看，这段时期江青和乒乓球界打的交道逐渐增多，还都在正常范围内。

◇ “乒乓外交”后江青对体育界频繁讲话

此后半年，江青没有召见乒乓球选手，一是因为乒乓球选手们1970年11月在瑞典举行的斯堪的纳维亚比赛中受挫于欧洲选手的弧圈球，信心受到撼动；二是选手们在为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紧张准备。但主要原因则是庐山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江青阵营受到林彪方面的冲击，她被吓了个半死。继而江青得到毛泽东支持，着手反击，占据了上风。为了在政治上全面压倒林彪，江青纠集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全面出击，忙得不亦乐乎。

1971年春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以庄则栋为代表的中国乒乓球选手与美国运动员交往，促成了美国乒乓球队在4月访华。周恩来接见了美国乒乓球队，并通过他们向美国领导人传递出信息，希望打破中美两国彼此间的隔绝，最终促成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秘密访华打破坚冰，世称“乒乓外交”。

中国乒乓球队声名大振，而国家体委军管会主任曹诚则被认为处事失当，被调职回到了军队。原任第三十八军政委、时任北京军区副政委的王猛调任体委主任。体委军管会原由总参谋部军训部负责人管领，属总参谋长黄永胜的指挥序列。王猛就任后，体委重归国务院序列，在政治局委员中分管文化事务的江青似乎看到了机会。

从1971年7月29日起到这年年底，江青先后六次参与体育界活动或讲话。而且，从这年8月31日起，江青把张春桥、姚文元也拉了进来，或一同讲话，或观看表演。此中深意，江青1971年11月14日在看乒乓球表演时不经意间说了出来：“我们今天不是来看打球的，是看政治球的。”原来，这时已在九一三事件之后，林彪自我爆炸，他的指挥班底土崩瓦解，江青野心迅速膨胀，讲话中增加了“批林”的内容。

12月29日，江青陪同美国学生代表团参观北京体育学院，特地将庄则栋调去进行打球表演，并主动和庄则栋等一起照相。

当晚，江青又到北京体育馆观看游泳和跳水表演，并在休息室向运动员长时间讲话，其间大谈林彪是怎么“迫害”她的。江青说：“我早上一起床，叶群就打电话来，说林彪要来见我，连我的作息时间都让他们掌握了。……他是什么副统帅呀，他一来我就得陪着，让我冒汗。他从来不讲政治，不知他讲些什么。”“我的房门钥匙，甚至连保险柜的钥匙都给他们掌握了。”

面对运动员，江青甚至讲起了自己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的“功劳”。她说：“在庐山会议时，他们大有炸平庐山之势，夺了两天半的权。我在华东组，本来把工作都做好了，那天晚上我睡了一个好觉。第二天早上我刚起床，春桥同志就来找我说，不好了，要抓人了。他给我一份简报。我一看简报，完全是反革命简报。”

江青讲话很跳跃，说主席说话了，他不当国家主席，你们不要做孙权，他也不做曹操。江青说到这里打住，问谁知道孙权、曹操是哪个朝代的人。

运动员中庄则栋读书比较多，历史知识比较丰富，他回答说：“是东汉末年、三国时代。”

对于这个回答，江青甚为满意。

◇ 企图拉拢王猛受到坚决抵制

江青此次观看体育表演，由新任体委主任王猛陪同。在这之前，江青特地给了王猛一本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此时她还追问，对《毛选》四卷读得怎么样。

王猛回答，读是读完了，但是理解得很不深，很差。

没想到江青却说：“你们比我还高明。我没有读完，是因为犯病，看书有时间限制。”说到这里，江青大言不惭地说：“我除了滑雪和滑冰以外，别的体育项目还都能拨弄两下子。我就是没有学过滑雪，也没有学过滑冰。怎么样？你们还有什么意见？对我有什么批评？”

对于江青的讲话，王猛认为很不得体。

其实，江青和王猛相识很晚。他们是1970年华北会议期间初次认识的。1971年7月调任国家体委主任，在许多场合下见到江青，王猛都十分恭敬，认为她是主席夫人，行止自当成为楷模。没有想到，在周恩来主持的一次会议上，江青一进会议厅就捧着头大喊大叫：“我受不了啦，头那么难受还要我来开会。”周恩来见状赶紧请她离开去休息。在场的王猛对江青的样子不以为然，觉得有失体统。

王猛上任后，江青不断去国家体委，不是看表演，就是讲话作指示，要不就是和选手们打乒乓球，总是要王猛陪同。1971年12月下旬的一天晚上，王猛下班后回到家里吃饭，突然接到庄则栋打来的电话，说：“首长（指江青）等你，请你赶快来人民大会堂。”王猛放下碗就走，到人民大会堂一看，原来是江青正在请一群乒乓球冠军吃饭，要王猛一起吃。王猛推托已用过晚餐，江青就吩咐给他倒了一杯酒。晚餐后江青兴致更高，拉上大家到毛家湾去看林彪的住处，王猛只好陪同。

江青领着参观了一通，一边看一边骂林彪。参观完了到会客室坐下，江青兴致勃勃地 and 世界女单冠军林慧卿掰手腕。林慧卿为了不让江青扫兴，故意输了。这下子江青更高兴了，点名要和王猛比。王猛只得伸出手去应付。总之，一晚上王猛筋疲力尽，很不自在。

王猛刚刚上任，工作千头万绪，忙得不可开交。没想到江青经常请王猛去钓鱼台看电影，一看就看到很晚。王猛是个正直、作风硬朗的人，对江青的做派看不惯，后来就不去陪江青看电影了。他在1971年12月或来年1月的体委党组会议上提出，今后根据情况，“首长”来时轮流陪同。

进入1972年，王猛尽量少和江青打交道，尽可能回避。渐渐地，江青对王猛的斥责也多了起来，这为日后江青要整掉王猛埋下了伏笔。由谁来取代王猛呢？江青属意庄则栋。

1972年庄则栋带队访问美国回国后，已经是体委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进入了体委决策层。江青认为可以从这里打进一个楔子，将王猛赶走。江青在寻找时机。一股难以预测的政治风暴，就要朝庄则栋卷去了。

□ 《党史博览》2013年第12期

~~~~~  
【文革访谈】

林彪专机服务队长访谈

• 陈 雷 • 黄建河 •

前不久，笔者利用国庆节长假专程赴丹东约见了曾在林彪专机上工作多年的孙福荣大姐。让我们没想到的是：她见我们时，身后竟跟着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伯，她说那人是她多年的老战友、老朋友，原任驻地某局副局长。寒暄中，笔者才意识到孙大姐让那人来，不是出于对远道而来的客人的尊重，而是怕自己在晚年终于开口说话，一旦讲出那些不准、不妥和不当的东西，好让自己最信任的人帮助把关和纠正。访谈，就是在这样一种谨慎、严肃、认真的气氛中开始的。

笔者：当年，你在被选调到北京工作前是怎样一个经历？

孙：1962年7月，我高中毕业，原打算报考中国医科大学，但父亲说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你还是去参军吧。于是，就在那年9月，我就近到驻地空二军医院当上了一名战士。很快，我被送去空军长春学习航空医学。1965年8月，我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被选调到空军直属的航空兵独立34师（北京西郊机场）服务队服役。

笔者：那是一支什么性质的部队？

孙：刚去时，我并不知道。只觉得每天学习训练内容特别多，有航空医学、气象学、地形学等等。当然，学得最多的还是保密知识，在天津民航学习的是外语、礼仪知识和服务知识。后来，才清楚我所在部队的前身是华北空运大队，1952年5月，扩编为空军独立第三团，直属空军总部领导。1963年10月，该团再次扩编，叫空军独立第34师，下辖三个机场（师的代号为7196部队）。这支部队，常年担负接送外国元首、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央军委主要领导的任务，是国内唯一一支空军特殊部队。

笔者：您还记得自己是什么时候正式值机的吗？

孙：怎么不记得。那是1965年10月，我正式结束机上实习，第一次独立值机，去西安接西北局书记刘澜涛。那以前，我曾跟随服务队老同志不止一次接送过周恩来总理、陈云、邓小平、康生、陆定一、朝鲜首相金日成、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一书记霍查、非洲赞比亚国总统卡翁达等。

由于我的每一段机上工作任务完成得都很顺利，很快得到了首长和师领导的肯定。1966年3月，师党委决定让我、袁玲和于永珍随刘少奇、陈毅和他们的夫人出访三国。出发前，先是师党委把我们机组人员召集到一起宣布出访任务，指派副师长时念堂任机长，100团王进中团长任副驾驶，确定机型是苏式伊尔-18。接着，中办汪东兴又将机组人员招去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开会，王光美、张茜和其他随行人员全部到会，汪东兴宣布了临时党支部组成人员，强调了外事纪律，出访重任。

会后，大家立即展开紧张的准备工作。机组人员按国家外交部规定的出国每人支出经费的标准去王府井大街指定普兰德西服店订制衣服、鞋帽、领带和袜子，记得每人做了3套西装和1件大衣。随后，又去王府井大街34号特供站采购机上用品，去北京饭店订购机上用餐，去

中国画报社和人民日报社采购机上读物等各类生活物资，服务队3人按规定分别对食品进行安全取样、留验。

3月26日中午，代表团车队陆续抵达机场，他们在总理、朱德和邓小平的欢送下登上飞机，我们立即将刘少奇主席、陈毅副总理、王光美和张茜夫人迎进各自包厢，袁玲和于永珍也按照我们事先安排，将代表团其他成员安排就绪。

我们先后到达了巴基斯坦、阿富汗和缅甸三国。每到一地，代表团成员被迎走后，接着是机组人员入住，我们离开机场之前，先检查维护飞机，确定没有隐患后，再将飞机交由所在国警戒。每次出席国宴，代表团领导都不忘叫上机组人员一起参加，遇上他们参观浏览也不忘我们。当然，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在宾馆待命。这次出访，由于王光美、张茜没有带生活随员，她俩需要更换的服饰等生活用品，都由我负责。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张茜在出访活动中，始终身穿一件中式上衣，下身穿着一件短裙，十分简朴。另外，她对机上服务人员也很客气，凡事总不忘道谢。

笔者：听说大姐后来在林彪专机上任服务队长，那是怎么回事？

孙：我们队隶属空34师司令部管理科，常年值守在西郊机场候机楼。随着老同志离队，我被提升为副队长。当时，全队下面有三个分队，党中央下令主席不坐飞机，但庐山会议毛主席乘坐了我们的专机。多年来，我们一直负责一、二、三组专机（也就是主席、总理和林彪专机）有任务即走，承担机上服务工作。其他国家大型的党和国家会议我们照样执行。

笔者：能唠唠你与林彪和他家人交往这方面情况吗？

孙：那时，我们师除了伊尔—18飞机，还有英制的“子爵号”。406号也曾是林彪的专机。我在担任林彪专机固定服务员前，曾接待过林彪和叶群。自那以后，接触林彪和他家人的次数自然就多了。林彪每次乘机多半都有叶群陪同，从师领导的交待中，我才得知叶是林办主任，夫人陪同是工作需要。林彪话少，只要坐进包厢，不是批阅文件，就是靠在弦窗凝思眺望，时常一看就是个把小时。林彪在机舱里很少食用机上备份的各种小吃。他与我有过的几次闲聊，也只是简单地询问一下我的经历。唯有一次他告诉我自己脊椎上还残留着弹片，所以，他说自己一直怕风、怕冷、怕受阳光刺激就可以解释了。叶群比较开朗，爱说话，口音是纯正的北京腔。她爱吃机上备好的各种小吃，每次选用，从不让林彪。一次，我给她送茶水，她问我多大了，并告诉我她女儿林豆豆比我大1岁，儿子林立果比我小1岁，让我以后不要叫她“主任”，改叫“阿姨”，管豆豆叫大姐，管立果叫弟弟。相互熟悉后，我经常搭乘师里的飞机，替林彪一家去各地采购新鲜水果、蔬菜和各种衣物。林彪爱吃豆子，我还专门给他采购过刚采摘的黄豆。每次弄回的东西，多由我从北京西郊送到毛家湾（林彪驻地）。

林彪乘机出行，大都带着女儿和儿子，豆豆每次乘机都十分自觉地坐进秘书工作舱，很少进父母包厢。她长得比较瘦弱，性格内向，尽管话少，但也总是主动与我聊天，特别有大姐样。由于我俩都是女孩子，比较谈得来。我很少与同机的林立果搭腔，只是暗自羡慕他个子高高大大，五官端正，话少老成。林立果不仅与我话少，跟他姐姐也从不闲聊。那段时间，豆豆想学开车，就到我们服务队所在的候机楼门前练，练累了，就到我办公室休息一会儿，呆够了再出去接着练。这中间，我时常尽自己的所能为她端茶倒水，鼓劲说笑。

后来，我又认识了张宁。当时，听空军副参谋长胡萍说她是林立果对象，被组织从南京调来北京解放军301医院学习。由于张宁那时已经开始随林家出去活动，为了小姑娘乘机方便，我便在自己宿舍给她加了一张床，叫张宁每次出行前都提前到我宿舍住，免得飞机随时起飞现

从单位往西郊机场跑。一来二去，我俩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一天，张宁对我说林立果对她总是不冷不热，她很闹心，这时，我才理解了张宁的苦衷。

笔者：“9.13”事件发生时，您在哪里？后来，您又怎样？

孙：这是我最怕回答的问题，也是我从来没有向外界回答过的问题。9月12号，我在候机室值班，我爱人齐爱玉在师作战值班室值班。晚上11点刚过，空军吴法宪司令员突然来了，他在候机室刚坐下，没等我上前打招呼，便让人通知时念堂师长马上来。片刻，时师长便从机场自家骑自行车赶到候机室。他一进屋，吴司令起身便问：“256号三叉戟是谁派去山海关的？”师长答：“不知道”。这时，我预感气氛不对，马上悄悄地溜出房间，自己办公室不敢回，只好呆立在大厅里。

我知道，256号三叉戟作为最新机型已改装为林副主席专机。我是7号上午带着服务员常桂珍，随机将林彪、叶群、林豆豆、大姐对象张青霖和张宁送去山海关机场的，后面还跟着一架安-24运输机，里面装的是首长“凯迪拉克”专用车、放映器材、饮用水等生活用品。完成任务后，我们随即返回北京。5天后，也就是12号晚8点多钟，256号三叉戟专机准备再次去山海关送林立果，我正准备登机，在场的空军司令部胡萍副参谋长将我叫住，说你把自己的皮箱取下来，明天再去。于是，我安排服务员魏秀玲随机出发了，但飞机没有返回。我一时弄不明白，放飞的专机，怎么搞不清是谁派的呢？很快，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也来到候机室，空军司令部胡萍副参谋长是什么时候来的我已记不清，几位首长在候机室一直在商量着什么事，我几次进去送水都没听明白。大约到了13日零点以后，他们一起走出候机室，直上三楼塔台。开登机梯的战士告诉我，首长都围着雷达屏幕在看什么，估计一时半会儿下不来。他鼓动我也上去看看，并说首长都认识你，能让你看。我出于好奇，真的上去了。站在首长身后，我看到荧光屏上有一个小亮点在慢慢移动，走着走着，那个亮点突然消失了。这时，全屋人没有一个有言语，相互愣愣地对视，表情严峻，一时就像傻了一样。我被吓得不知所措，马上溜回一楼候机大厅。不一会，胡副参谋长下来，将叠好的一个纸条递给我，让我去空勤灶旁的“工字楼”（林立果据点），随便将纸条交给谁都行。我说天这么晚了，那里能有人吗？他说肯定有。漆黑的夜晚，吓得我一路小跑将纸条送到。到今天，我也不知道哪纸条上写的是什么，只知道“工字楼”是林立果常去的地方。

到了后半夜，我突然发现候机楼外面的飞机跑道上有摩托车急驶，一辆接着一辆，车头都开着大灯，雪亮如昼，轰然作响的马达声，极其刺耳。天亮后，从营区内部得到消息，整个机场已被陆军部队戒严了。也就是从那一刻起，我和候机楼内的人被禁闭在了原地，并被收走了全部利器，以至家里及办公楼的钥匙。当时，我还不知道我爱人也同样被禁闭在了他值班的岗位上。

7天后，我们随同34师全体师以上干部，被有组织地拉到空军学院听传达文件。这时，才知道林彪、叶群和林立果在9月13号晚0点32分，在山海关机场乘坐256号三叉戟专机仓惶出逃，折戟沉沙温都尔汗。

回来后，我被作为林彪身边的人，转移到西山北京军区招待所，一人独居一室，接受组织审查。专案组规定我们“遇人不准交谈，在院子里不准乱串，和家人不准联系”。第一次去食堂吃饭时，我便看见了张宁、林彪秘书张云生、杨地、李春生、刘义纯。还有空4军814队的张莅勤、郁永珍和袁琳，据说，这3个人是林立果“小舰队”的成员。

3个月后，我们60余人又被移送到西山脚下的亚非学生疗养院。这时，我又发现林彪的内勤人员也来了。同时听说，我爱人也被关在空军学院接受审查，那里动用的手段比较狠，也



比较频。无休止的“交待”和“揭发”又持续了6个月，我反反复复写出的材料，堆起来足有尺把高，虽说我们没受到体罚，但精神压力是巨大的，特别是扔给母亲的女儿，叫我日思夜想。

1972年7月，我们这帮人又被移至北京市大兴县部队的团河农场接受劳动改造。大家被编成6个班（全部是穿军装的），开始同吃、同住、同劳动。在这里，我又看到了陈伯达的两个秘书（不穿军装），黄永胜的儿子黄向阳，还有几个熟人。第一次被允许探家时，我心里特别高兴！那时家里钥匙已被收走，我一回到师驻地，便直奔保卫科找钥匙。接待我的人说钥匙已找不到了，我不敢多问，扭头回到家，砸开门锁才进屋。这时，我看到家里所有的抽屉、箱子和柜子都被翻个底朝天，四处零乱，灰尘遍布。在收拾屋子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和一些国家领导人的合影照片、工作日记，都被作为“证据”搜走了。当时委屈再大，我还得按时归队。

笔者：劳改的日子总得有个头，您是什么时候被“解放”的？

孙：在团河我们呆了4年多。到了1975年，大家都觉得自己没有参与林彪的篡党夺权活动，而且当年大家都是被组织作为政治合格、业务过硬、作风优良的精英，选调到首长身边工作的，再呆下去实在冤枉，便纷纷鼓动林彪保健医蒋宝生，让他利用自己和周总理保健医卞大夫比较熟的关系，替大家转交申诉信。蒋答应了。林彪的几位秘书立即将大家的想法整理成文，蒋宝生很快将材料通过卞大夫递到了周总理手里。总理亲自作了批示，并将我们的信连同他的意见转给毛主席。很快，主席作了大约几十个字的批示，今天我只记得最后两句话：“适宜安置，各得其所”。就是根据这个批示，我们终于结束了先是接受审查，后是参加劳改的生活，分别回到各自原部队。

笔者：那以后您再没受到什么影响吧？

孙：怎么没有受到影响。还在我接受审查时，我家老齐于1973年就被开除党籍，作复员处理，回到老家辽宁省清源县。当时，组织并没审查出他与林彪和林立果有什么瓜葛，处分决定只是诬陷他“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表现不积极”。对我，虽说没给处分，但也属“控制使用”那种人。当时，空34师要把我爱人调到航校，我没同意。自己本着“落叶归根”的想法，要求回娘家部队空二军，但没人给联系。迫于无奈，1976年8月的一天，我贸然跑到沈阳，找到沈阳军区空军后勤部长，他是我入伍时空二军的老首长，所以对我的“政治问题”看得比较淡，他立即与空二军陈军长联系，对方当即答应收留我。回到空二军，我被分配到空军医院，领导先是让我去临床，后又让我到药局，再又让我去财务室，折腾几个来回，总是定不下来。最后，领导权衡利弊，让我做了后勤工作。我深知自己工作安排如此艰难，真正原因还是我背负的那个政治阴影。果不出所料，时隔一年，1977年9月，我被组织做了处理，安置到丹东市第一医院做医疗行政工作，直至2000年退休。

笔者：至今，您和林家人，以及同在林彪身边工作过的人还有联系吗？

孙：开始没有，也不敢有。那是政治形势好转后，1981年的一天，我突然接到林豆豆大姐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她说是通过张宁打听到我的电话号码的。10年音讯阻隔，我一时激动得语音颤抖，不知说什么好。大姐感觉到我很激动，她还是用自己那种惯有的绵声细语，向我讲述了个人10年来的经历，其中没有一句埋怨，更没有半句怨恨，有的只是淡定和乐观。听完大姐的讲述，我也向她讲述了自己10年的坎坷，但我少有她那种坦荡和大气。临了，大姐一再嘱咐我要注意身体，并邀请我一定去北京作客。

打那以后，我们有了热线联系。我去北京看她时，大姐的为人更叫我深受触动。“9·13”事件后，大姐被送去郑州一家汽车厂工作，她始终带着自己小时的保姆王淑媛老人共同生活，

直至后来返京，不离不弃。老人一再向我夸大姐对她孝敬，多次对我说“小时我伺候她，大时她伺候我，真比亲姑娘还亲”。

2002年，我爱人去世。当时，我没告诉豆豆大姐。她在北京听说后，特意打来电话对我进行安慰，情真意切，叫我泪眼涟涟。张宁比我小得多，自然主动联系我也多，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后，她和熟人合伙在本溪搞房地产开发，生意做得还不错。她的婚姻在经历两次失败后，1989年夏，一天，张宁用电话告诉我，她又结识了一位美籍华人林先生，准备结婚，让我去一起热闹热闹。当时，我因家务缠身，无法前往，只好无奈地谢绝了她的好意。后来，她给我寄来许多照片。再后来，她又给我寄来喜得贵子的全家福。至今，只要我一想起与张宁在一起的日子，我就默默地希望林先生能善待我的小妹，直到永远。

这些年，由于有豆豆大姐在，我们这些人时不时还聚一把。最隆重的一次是1998年聚会，她把我们从各地召集到北京，去“黄鹤大酒楼”热闹。大家劫后重逢，分外开心，举杯畅饮，情深意浓，那场景至今叫人难忘。

□ 《党史纵横》2013年第11期

~~~~~

【当事者言】

红卫兵大串联北京接待记

• 陈徒手 •

—

1966年8月文革势头迅速升温，毛泽东等领导人号召革命师生进行“串联”，参观学习，交流经验，希望以此打开运动的僵局，通过外力迫使领导层分化并抉择。来京串联的决定是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下发的，刹时间热情高涨的外省市高校师生纷纷涌向首都。据仓促成立的北京市委外地师生接待处粗略估计，从8月12日至16日留京人数高达13万人，8月29日达到30万人，而且来京人数越来越多，离京的人数反而见少。几十万人员突然来京，接待单位毫无准备，仓皇失措，在安排饮食、住宿方面均发生很大困难。

8月30日北京市服务管理局向上级报告说，外地革命师生来势很猛，短短半月内已出现两次来京高潮，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吃饭解决不了。报告中称，8月27、28、29日三天，每天都有大批外地师生吃饭没有得到妥善安排，有的师生一天只吃了一顿饭，更多的人到饭馆排队买饭，给饮食业门市供应增加了很大压力，普遍发生食品脱销、等候时间长等现象。在北京大学和北京站、永定门车站等地区，吃饭要等候2—3小时，外地师生意见很大，急切要求立即解决。

与“三年困难时期”相比，1966年北京面向常住居民的副食品供应已经大大改善，趋于正常应对水平。但是要突然供应额外30万人的吃喝问题，确实给整座城市的生产供应带来严峻的挑战（市委报告语）。由于供应能力严重不足，饮食行业除了应付本身门市业务外，全市每天能够挤出食品10万—12万斤，只能解决12万人的吃饭问题，远远不能满足外地师生30万人的饮食要求。而且供应外地师生只能是馒头、火烧、面包、饼干等干食品，流质食品和蔬菜根本无法提供。（见1966年8月30日市服务管理局致市财办《关于外省市革命师生来京后吃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意见》）

报告中还表示，饮食业供应外地师生的食品大部分是职工们加班加点赶制的，大部分职工工时超过了12个小时，有的长达15至16个小时，对此不少职工向单位领导提出抗议。崇文大通小吃店、宣武南来顺等单位职工承受不了疲累，明确提出要求8小时工作。宣武国营清真食堂职工要求一礼拜休息一天，甚至在食堂门口贴出“星期日停业休息”的通知书。

1966年9月初，为应付全市性的接待难题，很快筹建“市委接待外地革命师生委员会”，其实还是以“市委接待处生活组”班子运作，由市副食品局、服务局、粮食局、供销社、卫生局五个局人员组成。原来指定在饮食业领导工作经验丰富的金映光挂帅，没想到文革运动一深入，金映光却按照群众组织的要求，被停职反省。接待部门一下子陷入无人领导的境地，这样繁杂的行政事务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办，新市委无奈之下只得焦急地从市级机关来回扒拉，欲找出一个或几个革命性强、具备超强解决能力的专人来主事。

新市委几次发文强调：“我们首都的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感情，努力完成党中央和国务院交给我们的这一个光荣而又艰巨的政治任务，千方百计地做好对外地革命师生的接待工作。”在那样风云激荡、管理逐渐失控的年月，解决全市性的吃喝拉撒的琐碎问题，非得有一批才干特殊、意志坚韧、善于协调的人物才能搞定，不是简单空喊几句革命口号就能解决。在文革前半期，北京经常举行超大规模的群众集会，譬如数百万红卫兵被接见、大型国庆游行、百万群众上街游行表态等，其壮观景象和组织规模都令世界目瞪口呆。在这些运动开展之中已经培育成一支干练、有效的幕后团队，他们是文革运动相伴而生、吃苦耐劳的行政奇才，堪称世界官员队伍中最善于筹划做事的人物。

二

在短时间内怎么解决几十万人的食宿问题严峻地摆在北京新市委及财贸部门面前。中央高层贸然地决定串联，却不会多考虑其间操作的困难程度。由于上级旨意，北京各级领导意识到此事必须做好，不能因处理不慎而酿成外地师生的民愤。所以市委多次谨慎地告诫：“解决好外地来京师生吃饭，是一个政治问题，弄不好，会造成严重的政治损失。”

北京市一开始就确定一个属地管理原则，即外地革命师生住宿在哪个区，即由所在区负责供应伙食；临时搭棚住宿的，统建新住宅房住宿的，以及火车站、参观接待人数集中的地区，也都由所在区组织伙食供应工作。同时实行定点“五包”，指定人员聚集较多的居住点应负责的承包单位，譬如，东城区除继续负责供应东大桥居住点的主食和咸菜外，还要担负新中街居住点的全部接待责任；朝阳区，担负左家庄、农业展览馆两个居住点的全部接待责任；东大桥居住点的主食和咸菜除由东城区负责外，其余各项也由朝阳区负责；西城区负责地质学校、北京展览馆、建筑学校三个居住点的全部接待工作；海淀区，负责社会主义教育学院居住点的主食调剂，该居住点的其余各项，均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为协助各区的领导和管理，在以上各居住点工作的市接待处干部，仍留守原岗位，或由各区调配，市接待处不予抽回。（见1966年9月20日市委外地革命师生接待处《关于明确若干居住点“五包”责任的通知》）

仅仅依靠饮食、食品业无法解决30万外来人口的日常供应，市委接待处建议市委指示本市各机关、工厂、企业内部职工食堂和街道居民食堂，立即行动起来，接收一部分外地师生入伙或供应主食品。具体规定如下：各接待单位负责安排好住在本单位的外地革命师生的伙食供应，动员炊事力量，尽量吸收外地革命师生在本单位食堂入伙。没有食堂或食堂做不了的，应负责与附近单位的职工食堂、街道居民食堂或饭馆、食品店联系挂钩，就近供应伙食。同时，没有住宿外地革命师生的单位，要积极组织炊事力量，充分利用炊事设备，积极吸收外地师生入伙，或组织代加工饭菜食品。外地革命师生需要外出参观、参加集会时，应从原伙食供应单位自带干粮。（见1966年9月8日市委接待外地革命师生委员会《关于对外地革命师生伙

食供应工作的有关规定和要求》)这就意味着已动员中心城区所有的炊事力量为来京师生服务,虽然多是加工制作干食品和简单汤类,但日复一日,已是极为繁琐、不堪重压的任务。为了减少街面门市供应压力,满足外地师生吃饭需要,市各级组织还呼吁本市干部、工人、学生暂时不要到饭馆吃饭,以便集中力量解决急需。

1966年9月底,上级指示要组织外地师生参加天安门国庆游行,向世界展示红卫兵昂扬的精神风貌,为此在国庆期间对他们的生活要作适当的照顾,决定节日生活费每人增加四角,尽量做到吃饱吃好。此条指示定义为“体现党中央、毛主席对外地革命师生的关怀”,为了落实这一精神,北京市动员广泛人力,既要翻出仓库存货,又得在几天时间内从远郊区、相邻外省紧急调集大量蛋品和水果,以保证当日参加游行时每人可携带鸡蛋三个、水果一斤。如果有的接待单位供应不及,可用饼干补充,由就近食品店、副食店准备货源。

10月下旬外地来京师生继续猛增,已经大大超出全市现有接待能力,多处供应点出现瘫痪,已有不少外地师生在露天流落、无处吃饭。北京市只能决定,本市各影院、剧场、俱乐部暂时停演,一律接待外地师生住宿,供应标准为每人一顿半斤饼干,一天一斤半饼干,如条件允许,可由饮食业供应部分火烧、馒头。很快城内影剧院人满为患,杂乱一团,集体居住人员多拿饼干充饥,颇有几分狼狈。这是许多外地师生来之前所没有想象到的,他们原本以为红色首都应是供应富裕、吃喝满足、热情高涨的城市。

三

1966年8月头几批外地师生来京办理食宿时,尚有较正规的手续程序。考虑到来京参加革命的急迫性和正义性,接待者多采用软性、灵活的办法,不少因经济困难而没有带钱和粮票的师生,可以向市委接待处申请领取垫付伙食费的介绍信,然后由接待单位免费负责食宿。由于来京人数过于庞大,很多人嫌手续麻烦,申请垫付等候时间长,就干脆不办理市委接待处证明,直接到学校和饭馆要求供给吃饭。这样原先没有办理垫付伙食费的外地师生,见状深感不合理,要求退还自己已花用的伙食费。而北京本地师生看到外地师生免费吃住,也觉得不公,他们指责市委接待处没有阶级观点,审查工作不力,不分对象、出身,随意开给垫付伙食费证明。

到了9月初,鉴于手续复杂、执行前后不一造成师生的不满,在当时气势磅礴的运动高潮之时,中央高层毅然决定:“外地革命师生在京期间,吃饭自交粮票,伙食费由国家开支,在未报销前,暂由各供应单位垫付。”中央甚至还明确指定,此规定从9月6日起执行,之前自费部分可适当退费。由国家统一包干饭费,只收粮票,一劳永逸地改变了垫付伙食费的混乱状况。

北京市据此确定,外地师生在京供应标准每天折粮一斤二两,每人每天饭费不超过五角(早餐一角,午晚餐各二角)。报销的运行图如下:“各接待单位,按实际供应天数,给供货单位开收据,注明品名、数量、单价、金额和供应人数。各供货单位将收据转管理处,凭收据到市委接待处换信后,到区财政局报销。”(见1966年10月29日市委外地革命师生接待处《关于各公共娱乐场所接待外地师生供应结算办法的紧急通知》)免费就餐方式也有相应的政策规定:一律凭区委接待处就餐介绍信供应,就餐天数按介绍信所列期限严格掌握,没有就餐介绍信的饭费由本人自理。垫付饭费后,由就餐师生代表按实际用餐的人数、钱数开列清单,以便结算。对没有带粮票的,凭区委接待处证明,给予垫付,每人每天不超过一斤二两。垫付后由外地革命师生开具欠条,向所在区油粮管理处结算。垫付周转粮不足时,可向油粮管理处暂借。(见1966年9月8日市委接待外地革命师生委员会《关于对外地革命师生伙食供应工作的有关规定和要求》)

从报销渠道可以看出，各级事业、企业单位垫付的伙食费由所在单位列支，按隶属关系分级归口，凭据结算，市、区财政局，市、区各主管口均可审核拨付。能够主持报销的部门过多，审核批准的权限过宽，造成钱财大量流失。以国家、革命名义“资助”参与者，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中极为特殊的做法。市委规定，此项费用列支“其他支出”款，下设“外地革命师生伙食费”一项，市级各有关局及区财政局，对此项费用，按月向市财政局报表，以便拨款。垫付伙食费周转金不足时，按以上顺序，向主管口暂借。从现存开放的档案中，还无法查阅到“外地革命师生伙食费”实际发生的费用数目，但简单估算一下，30万人平均一天5角钱就得花费15万元，再加上粗放、随意的发放方式，日积月累，这种全市规模、不加限制的流水账数字应该是十分惊人的。但对于主政者来说，这种钱财的尽兴使用和挥霍，能够动员和保障青年群众投入运动的热情，符合文化大革命摧枯拉朽的走势，钱数大小是细枝末节问题。

四

外地革命师生是作为“毛主席的客人”予以热情接待的，北京市向中央的保证是“尽可能让他们吃好、睡好”。但由于完全公费供应饮食，管理松懈，随意性强，浪费现象随之大量呈现。粮食部门首先抱怨口粮浪费极为严重，社会影响不好。

由于高层确定每人每天一律供应一斤二两，不少接待单位就不分男女、年龄，一天早中晚三顿每顿都吃四两，甚至鼓励随便吃，平均每人每天吃到一斤六两。再加上制作食品质量差，北方工艺粗糙，南方来的学生大都不爱吃，随手扔掉毫不足惜。9月25日市粮食局报告说，东城区黄城根小学住有杭州、甘肃等地的学生1600多名，在六天当中就搜集霉坏变质的馒头、窝头200多斤，一〇一中学几天中扔掉的馒头窝头也有一大桶（约200斤）。入冬以后浪费现象愈加厉害，11月2日市粮食局报告称，光是朝阳区文革里大楼一处收集学生吃不了和扔掉的干馒头就达9600多斤。

由于此次接待作为政治任务布置，时间紧迫，管理手续不健全，存有大量的制度漏洞，每个经手单位几乎都有一大笔糊涂账。譬如西城区西四小吃店负责供应由北大、北师大及相近四五个小学接待的来京师生的熟食，由该店加工成品以后送到学校。但因为任务急，出库时没有清点数字，出售时也没有在意交没交粮票，究竟亏短多少粮食也没有数目。据主管人员估算，这家小吃店已累计亏损粮食8000多斤。（见1966年9月25日市粮食局致市人委财贸办公室《关于来京串联的外地革命师生粮食供应方面几个问题的解决意见》）当时京城食品店家出现亏空较为普遍，领导方面出于形势考虑，一般情况下也不予追究。

随着运动的深入，外地师生来京的规模不见缩小，只不过声势在不断压低。北京市的接待方式也在适当改变，日益简化和便利，譬如由接待单位凭外地师生的介绍信或证件办理登记手续，发给就餐证，凭登记表作为结算根据；接待单位每隔十日，将十日内接待人数按省、市分大学、中学、其他，由各系统报市委接待处；外地师生住定后，原则上不调换接待单位。在细节上也注意完善，力求避免原有粗心大意的毛病，如办完手续后在介绍信或学生证盖上“食宿已办（京）”的印章或字样，有意堵截其间明显的漏洞。再如，原来在办理食宿登记手续时，要同时发给外地师生免费乘车证，但不注意回收。此后规定外地师生离京时必须将市内乘车证收回，凭当日火车票乘坐市内电、汽车到达火车站。

北京市接待的细致和周到也是出了名的。本来外地师生返回原校时的途中伙食费应由自己负责，但又说因家庭生活困难、来京时带钱不足、同学间又无法调剂、不慎将生活费用丢失等多种原因，允许师生开借条领款，由北京市负责此笔开支，每人每天五角，超过六小时不足二十四小时者，以一天论。但特别注明北京至天津、唐山、济南等短途线路不予借款。不过，接待部门一直在争论，到底只供应到铁道车站，还是一直供应到原校（包括火车、汽车及步行）？

两个意见纠结许久，各说各的理。从这个小细节可以看出北京主事者的心细和心善，愿意把好事成全到底。

后来有不少人反映，途中购买食品实在困难，北京市又临时起意不借给现金，供应同等价值的熟食品、饼干上车携带，以保证路途食用。

五

1966年10月下旬北京气温急剧下降，10月26日刮起七级西北风，气温降至零摄氏度，27日夜有冰冻，气温继续降至零下3摄氏度。许多外地师生并没有穿戴棉衣来京，不少人受冻生病。当时在京的外地师生约有百万人之多，御寒能力甚弱。10月27日深夜，市委接待处连夜赶写《关于去北京串联要带好御寒衣被的紧急通知》，请全国铁路沿线各站代为广播，并抄成大字报张贴。通知强调，希望来京串联的革命师生，一定要穿好棉衣，带上棉被。如果我们不准备好御寒棉衣、棉被，就急忙动身，将会冻坏身体，影响健康，这对完成革命串联任务是很不利的。现在，可以来北京串联的期限已经延长。没有准备好棉衣棉被的同志，希望大家准备好了以后再动身来北京。

但是，这依然没有阻挡住各地来京者的脚步，提前到来的寒冷令北京接待方措手不及。各接待单位只得动员内部职工大量支援旧衣服、被褥，借给衣着单薄的外地师生临时穿用。市里又通过租赁公司，租用数量不菲的棉被分发使用。这里很快出现一个难题，很多外地师生穿着借用的衣服出走，事后不能归还。后来市领导只能决定，按其新旧程度赔偿职工，布票、棉花票由单位开证明信，到商业部门解决，价款可以实报实销。因为涉及职工家庭冬季使用，这项补尾工作较为紧迫，费时较长，波及面大，大家都被来回折腾数次。

有趣的是，外地师生打了借条，穿着在京领到的棉衣或绒衣裤回家。1966年12月15日，北京市委外地革命师生接待委员会专门致函各省市、自治区、各专区、县（旗）人委会，称这些衣服是国家的一项重要统配物资，为了严格借还手续，曾规定凡借用衣服的同学，返校后必须把衣服送交当地人委。现在由北京借出单位把“借条存根（第一联）”直接寄给各省市，请各地尽量将这些衣服收回，收回后由各地统一处理。（见《关于联系革命师生归还棉、绒衣问题的函》）在当时生活条件普遍不良的情况下，化公为私成为普遍的现象，让衣物交公实为难事，而且让当地部门去回收处理纯属敷衍之举，这种大面积散发的官家函件只能是官僚系统的例行公事而已。

最为麻烦的是，各单位为接待外地师生，购置不少棉被、棉毯、棉绒衣及各种器具、设备，使用之后原以为可以上交上级，报销所垫付的设备购置费。但是中央又发来通知，革命大串联明春将继续进行。因此这些物资仍需备用，由各主要单位负责保管。为了防止棉被霉坏，市里要求各单位组织人力，将大批量的棉被拆洗后入库保管，拆洗费可以报销。这种额外负担已让各业务单位苦不堪言，光是保管棉被一项就得在场地、拆洗等方面花费不少精力。

六

1966年国庆过后，大量外地师生滞留北京不归，大都穿梭在国家重要机关参与文革事务。北京市无法在现有房屋中解决几十万人的住宿问题，只得仓促决定在市区街道、空地搭建临时席棚。由于任务大，要求急，多是限期完成，各施工单位进行突击，并主动垫出急需的钢材、木材和水泥。

据市土产经营处10月11日报告称，这次供应各学校、机关、企业搭席棚用的席子共6

1万多片，竹尖67万根，毛竹6万根，草帘、厚草垫、蒲草褥子、草袋子、草片122万片，总值400多万元，共计一千多节火车的物资。（见《关于接待外地来京革命师生所用土产品的结算和收回处理意见》）市委接待处估计全市搭建席棚约28万平方米，几乎把中心城区空地覆盖，嘈杂零乱，整个市容为之一变。到了12月天气寒冷，席棚已不适于住人。由于是临时短期项目，在防漏、地面排水方面没有采取妥善的措施，从安全上看不能长期保留。如果再经过冬季风雪的侵蚀，修建的各种物资将受很大损失。市委决定，除了陶然亭游泳池和天坛西门内马路两侧席棚作为临时候车室，暂缓拆除外，其余各处，要求在12月25日以前，陆续拆完。

考虑到转年接待串联的任务仍将繁重，势必还要搭建一定数量的席棚，作为接待用房。因此，决定席棚拆下来的物资，除席子、油毡、铅丝可酌情处理一部分外，其余物资全部保存，以便明年继续使用。但是绝大部分草帘、草垫、蒲褥子、苇箔、麻绳和竹子席子，都已经残损无用，即以报废处理。还有相当多的厚草垫、蒲褥子，市里已无仓库储存，只能责成各单位行政或革命委员会负责，就地处理给群众或本单位留用。

损失最大的是用于安装锅炉、做烟筒和水管接头的钢材，还有杉篙、立柱等建筑木材，都是国家紧缺的物资，被强迫征用盖席棚后影响了许多单位的生产计划。搭盖席棚时，安装了大量的自来水、电灯、锅炉、炊事用具等设备，一旦拆除就会严重积压浪费，市里也不知该如何统一处理。无奈之下，市委接待处只能含糊地恳求，为了做到物尽其用，希望分别由原供应单位合理折价回收，折价损失及消耗部分由国家予以报销。

随着文革运动的升级，接待外地师生的高潮频频到来，不容人喘息。接待事务中的诸多财务问题接踵而来，市委接待处相关报销文件频繁出台，数日就有一件，有的请示报告直接报给周总理处的周荣鑫（国务院秘书长）。

10月14日市委接待处请示报告中说，接待外地革命师生所用的伙食费、医疗费、水电费、饮水、取暖用煤、报纸、大字报纸墨等零星宣传费用，中央机关、大专院校、市级机关临时雇用的炊事员、临时工工资，由接待费报销。外地支援首都接待工作的汽车队人员、炊事员、医务人员及协助工作的本市大专院校、中学生、红卫兵生活有困难的，每人每天补助伙食费1.5角至2角。

10月24日市委接待处再次报告称，张贴毛主席像、毛主席语录及零星宣传用品等，可以报销；给外地革命师生订阅报纸，可在50人一份的范围内酌情订阅；外地学生抄写材料用纸，写大字报用的纸、笔、墨等可以报销；外地革命师生的医疗费、住院伙食费，按实际用量报销；外地学生死亡火葬费，死者的直系亲属来京往返车费，可以报销等等。

这些报告事无巨细，几乎涵盖在京生活所有的方方面面，能够想到的大小事最终都可以由国家出面报销。在文字政策层面上已经出现一个样式：照例会说费用应由学生自付或催还，但充分考虑到来京学生的实际生活困难，还是由接待部门报销。实际上入账报销门槛很低，师生只要一呈述困难，所有生活开支都可由国家埋单。仅举其中一例，就可说明报销尺度之宽大：“学生用的长途电话应由学生付费，所欠费用接待单位催还，最后还不回来的拟给报销。”（见1966年10月24日市委接待外地革命师生委员会行政组《关于内部掌握的几项开支问题》）

七

1966年下半年毛泽东数次接见来京串联的几十万红卫兵，由于运送人数过于庞大，国务院从相近省市临时抽调1500辆客车和6000名司机、乘务人员，来京承担运输任务。到了11月下旬暂停乘车船串联以后，仍有六个省市的450辆客车继续留京服务。

为了方便外地师生市内乘车，从9月26日起，每日上午7时至10时、下午3时至7时两个时段，北京市特意开办七条公共汽车免费专线，由市内前门、北海、西单、东单、和平里等处直达北大、清华、人民大学、石油学院，便于外地师生早晚进出城。

原来发放的市内公交乘车证都填写有效日期，以防止师生长时间使用。但是，9月中旬高层指示北京各接待单位要切实做好对外地革命师生的“五保”（保住、保吃、保交通、保医疗、保宣传解释）之后，北京市又急忙决定，自9月17日零时起，乘车证一律不填写有效日期，原已填写的，效用与未填写的相同。这就意味着，持有一张乘车证，就可以无限期地满城游逛。

时间一长，几十万人在首都游荡也给高层带来莫名的压力。9月23日，铁道部和市委联合发出“乘坐火车”通知，其中就提到，“还必须有计划、有组织、有秩序地做好欢送工作，落实组织安排，减少革命师生在车站等候的时间”。当年年底，经过几个月磨合，逐渐形成这样一个发放车票的模式：经接待单位审查同意后，将人数、所到站于乘车前三天向区、口发票点提出，区、口发票点汇总后，到东单发票处领取免费火车票。各接待单位应在学生证件上加盖或注明已发车票戳记字样。（见1966年12月23日市委接待委员会《关于十二月二十一日后离京乘车暂行办法的通知》）

为了让来京串联的师生迅速返回原地，后来又更改办理返程火车票的办法，变得更加简便，就是各接待单位负责填写借款三联单，由借款人持三联单直接到北京站、永定门站换取火车票上车。铁路售票点火车票发出后，凭三联单的二三联定期统一向市委接待处结算。此套方式演练成熟后，又蜕化成“凭证换票、定期结算、统一付款”的一套全新办法。付款则采取了“托收无承付”方式，由铁路售票处在人民银行设专户，各单位事先将换票凭证使用的印鉴和账号一式二份交给车票联络站，其中一份转交售票处，以资识别。各付款银行凭铁路售票处的无承付凭证，由购票单位账号内付款。

正是靠着这种三联单出票方式，简易解决了前后几十万人离京的手续问题。在那个特殊年代的车票上，除了时间、车次、到站地，还会加盖“不准转卖、退款”戳记。这样的车票凝聚了那个年代特定的癫狂和荒诞，也蕴含难以估计的国家损失。

（作者为《北京青年报》编辑）

□ 《炎黄春秋》2013年第12期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胡海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		
